

[上^冊]

岳麓書社

說文
解今
字釋

SHUOWEN

[東漢]許慎 / 原著 湯可敬 / 撰

JIEZIJINSHI

[下^冊]

岳麓書社

說文解字釋
說解今釋

SHUOWEN
[東漢]許慎/原著 湯可敬/撰
JIEZIJINSHI



說文解字今釋
SHUOWENJIEZIJINSHI
岳叢書社

ISBN 7-80665-140-3



9 787806 651407 >

ISBN 7-80665-140-3/II.32
(全二册)定價: 97.80圓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說文解字今釋/(東漢)許慎著;湯可敬撰.—長沙:
岳麓書社,2001

ISBN 7-80665-140-3

I.說... II.①許...②湯... III.說文解字—注釋
IV.H16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1)第 084362 號

責任編輯 梅季坤

封面設計 黃朝

說文解字今釋(上、下)

湯可敬 撰

岳麓書社出版發行(長沙市新民路 10 號)

湖南省新華書店經銷 長沙鴻發印務實業有限公司印刷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新 1 版第 2 次印刷

開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78.75

字數:1,900,000 印數:16,001—20,000

ISBN7-80665-140-3

H·32(全二冊) 定價:97.80 元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承印廠調換

廠址:長沙縣高橋鎮 郵編:410145

序

梅 季

《說文解字》是我國第一部按照偏旁部首編排的字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字書之一。這部處于中國語言文字學草創時代的不朽名著，為東漢著名學者許慎撰著。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偃城縣）人。大約于東漢光武帝建武三十年（公元 54 年）至明帝永平元年（公元 58 年）之間，出生在汝水旁邊今偃城許莊村。他八歲左右入小學，讀李斯《蒼頡篇》、趙高《爰歷篇》、揚雄《訓纂篇》、史游《急就篇》等童蒙讀物，識字五千多。稍長，開始通讀《論語》、《孝經》，然後“博學經籍”，攻讀今文《五經》，旁及先秦諸子百家和天文、曆算、醫藥、歷史等著作，與當時大多數專治一經的學生不同，為以後著述打下了知識基礎。成年時，能背誦《五經》，默寫九千多個單字，應試為小吏。由于學識淵博，不久便升任汝南郡功曹，協助郡守掌管政務、人事。他勤懇任職，廉潔奉公，性格淳篤，對上忠厚誠實，對下恭謹寬仁，因而被舉為孝廉。

章帝建初八年（公元 83 年）十二月，詔令丞相設四科廣選天下奇才名士，許慎因聰明幹練、品學兼優而被推薦入京，以“德行高妙、志節清白”第一科選士分配到太尉府，充職南閣祭酒，從事文書一類工作。當時古文經學大學者賈逵，奉詔令在黃門署講授《左傳》、《穀梁春秋》、古文《尚文》、《毛詩》等，許慎又被群儒推舉為高材生，得以拜賈逵為師“受古學”，從此學業大進。他在公事和學習之餘，便開始鑽研學問了，曾撰著《孝經孔氏古文說》及《淮南子注》。他精通戰國時六國文字，又貫通今文、古文經學，時人譽為“五經無雙許叔重”，被校書郎中、一代通儒馬融敬重，于是以太尉府掾史屬南閣祭酒身份，詣東漢藏書處所東觀校定《五經》，眼界開闊，涉獵更廣。這時他還為小黃門孟生、李喜等人教授經傳，兼職為鄧太后中官近臣的老師。他在這段時間，曾撰就《五經異義》10 卷，積二十多年資料于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 100 年）正月草成不朽名著《說文解字》，并作《後叙》。《說文解字》一至十四卷為文字解說，十五卷為叙目，每卷分上下，實為 30 卷，按 540 個部首共收字 9353 個，重文 1163 個，解說內容 133441 字，以小篆為準，兼有古文、籀文等異體，每個文字的解釋，往往先說明字義，再分析字形構造，然後辨識音讀。

安帝元初六年（公元 119 年），洛陽及附近四十二處

地方發生地震，災情嚴重，詔令選派德行高又有謀略的掾屬和孝廉五十多人，下到各地當令長、丞、尉，許慎被任命為涿長——涿縣縣令。雖然南閩祭酒品秩不過百石，令長品秩少者三百石，多者則有千石，這次調動職務是升遷，但此時許慎已有六十餘歲，加之出身儒學，潛心著述，已淡于仕途，于是在出任涿長之前，就稱病請假回到了家鄉許莊。他家居時又最后補充、修改、訂正《說文解字》，于安帝建光元年（公元 121 年）使之成為定稿，得知昔日洛陽的學生孟生、李喜當時已升任中常侍，親近皇上，便在九月二十日派遣兒子許冲帶上此稿和《孝經孔氏古文說》，前往京師奏呈安帝。十月十九日，皇上賞賜布四十匹，以示獎勵。許慎在京時，已名聲大震，回家隱居講學，學子慕名而來者甚多，地處祖國西南邊境的尹珍，以為生在荒裔，不知禮義，故不遠萬里來到召陵萬歲里，投這位舉世無雙的經師學習。許慎大約在桓帝建和元年至三年（公元 147—149 年）之間逝世于家，高壽九十餘，葬許莊東北角，後從祀于文廟。

《說文解字》在中國語言學史上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它首立了部首排列法，開創後世字典編排、查檢之先河；它保存了上古豐富的文字資料，是我們今人研究甲骨文、金文不可缺少的階梯，是研究小篆體的直接樣本；它闡發了前人的六書說，並首先運用六書理論分析漢字的

形體構造，釋義以形為主，因形說義，說義以明本義為主，旁及引申義與假借義，通過以形索義、因聲求源的義訓和聲訓兩種方法，訓古語，釋方言，明典章，因而這部字典，又是人們系統認識、掌握上古語音、詞匯和讀通先秦兩漢古籍的重要工具書。它的出現，不僅使文字學正式成為一門科學，而且對音韻學、訓詁學、詞匯學的萌芽或發展，也產生了重大影響，經歷兩千年悠悠歲月，至今仍被千千萬萬的讀書人翻檢、捧讀、背誦、臨摹和鑽研。

八十年代中，我在總編輯領導下規劃《古典名著普及文庫》和《古典名著今譯讀本》一百種時，在語言類要籍名著中，只列了《說文解字》和《經傳釋詞》，後者曾以李維琦先生據黃侃按語、楊樹達手批本點校整理推出。九十年代初，我國古漢語學界著名老專家、湖南師大中文系教授周秉鈞先生向本社推薦了益陽師專中文系主任湯可敬教授撰著的《白話說文》書稿，並親自為作者審訂了卷一至卷十一部分，經反復論證，決定將其易名為《說文解字今釋》，但未納入《古典名著普及文庫》之中。

我第一次認識湯可敬先生，是在一九八四年中國訓詁學研究會西安年會上。彼時周秉鈞先生將自己的得意弟子、一位敦實的中年學者介紹給我時，只說了兩句話：“湯老師很會讀書，也很會做學問。”周先生不但治學、教學謹嚴，而且日常談吐也非常嚴謹，所說信焉。

湯可敬先生一九四一年元月出生于湖南益陽一戶農家，一九六三年七月畢業于湖南師院（今湖南師大）中文系。一九九二年被評聘為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貼，一九九三年被評為全國優秀教師。三十多年來，他認為一個高校的教師，必須從教學實踐中去尋找自己的科研課題，通過科研升華為理論，又回過頭來指導自己的教學。一九八九年發表的《古漢語源頭專籍教授法》論文，突破傳統的“條例十例證”教法，採用古漢語其幾個重點分支學科領域的第一本或比較早期的完整的專門典籍，如《論語》、《孟子》、《說文》等作為教材，便于培養學生多角度多層次地整體把握古籍的能力，便于貫徹學以致用原則，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一九九〇年《中國語文天地》曾突出地報導了這一教法。作為這種教學法的有機組成部分，湯先生編著的八十餘萬字的《新編古代漢語》，北京出版社于一九八九年出版，九二年修訂時更名為《古代漢語》，曾榮獲國家教委第二屆（1986—1989）全國普通高校優秀教材獎。此外，湯先生還有《詞詮述評》、《部首說略》、《說文“多形多聲說”研究》等四十多篇論文發表，“會讀書、會做學問”之譽，實不為過。

湯先生鑽研《說文》多年，所撰之《說文解字今釋》長達一百六十五萬字。書稿以大徐本為底本，按照許慎的思路，通過每個字條的句讀、注音、譯文和注釋，盡力逐

條解說清楚許慎原文的含意，然後引用甲骨文、金文等文字材料以供參證。全書標點精細，校勘詳審，注音準確，譯文明白通暢，注釋簡易明瞭，參證部分或肯定許慎說解文字的英明科學，或指出許慎因受時代、條件的歷史局限而出現的某些謬誤。書稿全面吸收宋代以來尤其是近百年以來《說文學》、古文字學的研究成果，並以作者之獨到心裁，使一部難認難讀、難釋難懂的《說文解字》，成為文理科學子皆宜、雅俗共賞之作。我對此稿之審閱和清樣之校讀，費時一年有餘，在講究經濟利益之今天之所以能甘坐冷板凳作嫁衣者，實為此書之價值，字字句句審校下去，覺得人生頗有樂趣，而于勝義之處，又不時擊節而嘆，怡然有得。為使書稿更加完美，我對許慎原文之點校曾稍作訂正，對譯文稍作修飾，對注釋稍作補充，對凡例仔細推敲，而對參證部分，則作了較多的刪汰，從而更突出書稿的學術性與科學性。然而自己下筆之時，又不時有班門弄斧之感，誠惶誠恐，聊以陋文作為小序。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于岳麓山下探微齋

前 言

清代學者王鳴盛在《說文解字正義序》中說：“《說文》為天下第一種書。讀遍天下書，不讀《說文》，猶不讀也。但能通《說文》，餘書皆未讀，不可謂非通儒也。”此說推崇《說文》未免太過。但是，如果換一個角度，也許並不過分。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系統，是社會交際的工具，是人類文明的載體，《說文》是漢民族第一分析字形、說解字義、辨識聲讀的字典，是不朽的詞匯著作，是東漢以前的百科全書，說它是“天下第一種書”，又有什麼奇怪的呢？

一 許慎和《說文》的寫作

《說文》的產生，不是偶然的，是東漢的客觀條件與許慎的主觀條件碰撞的結果。

第一，周秦兩漢的文字、詞匯研究，為《說文》的出現奠定了學術基礎。西周有《史籀篇》，秦朝有《倉頡篇》、《爰歷篇》、《博學篇》，西漢有《凡將篇》、《急就篇》、《元尚篇》、《訓纂篇》，東漢有《滂熹篇》；還有成書于漢初的《爾雅》，成書于西漢末年的《方言》；還有從地下或牆壁裏挖掘出來的古本，從山川得到的鼎彝上的銘文：諸如此類，都為《說文》的成書準備了成千上萬的各種體式的單字。周秦兩漢《史籀篇》之類的識字課本和《爾雅》、《方言》諸書，為《說文》的編排提供了借鑒。許慎以前的經學家和小學家關於漢字形音義諸方面的研究成果，比如“六書說”，就為

《說文》提供了理論指導。

第二，漢代今古文學派的激烈鬥爭，為《說文》的出現奠定了思想基礎。今文是指隸書，古文是指先秦六國古文。經典因記載的文字不同而分為今文經典和古文經典，這本來只是字體的不同，但研究的人却形成了不同的學術派別。今文經學派認為經書是聖人之言，字字句句寓有“微言大義”，大可經世致用，常常斷章取義，任意引伸比附。古文經學派認為應該根據字義客觀地解釋經義，應該重視語言文字之學，樹立它在經學上的崇高地位。許慎是古文經學家，他生活在東漢中葉之後。此時，正值今文經學派逐漸衰落，古文經學派逐漸興盛。他不能容忍為要經世致用而曲解文字的現象，他猛烈抨擊那些“玩其所習，蔽所希聞”的俗儒，那些“競說字解經，喧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的鄙夫。他認為文字是“經藝之本，王政之始”，曲解文字必然篡改“經藝”，不利于“王政”。為了駁斥今文經學家篡改經義的說法，許慎立志寫作《說文解字》。

第三，許慎淵薄的學識和求是的精神使他這種志向變為現實。《後漢書·儒林傳·許慎傳》說：“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可見其學識當為同輩人之出類拔萃者。《許慎傳》又說：“性淳篤。”淳，純實；篤，忠厚。就是說許慎一輩子忠厚老實，實事求是。正因為這樣，他才能上下求索，博採通人，力求作到小大立論，信而有證。“其于所不知，蓋闕如也。”（見《說文序》）對於自己不知道的東西，讓它缺着，不自以為是，強作解人。

許慎把龐雜的漢字分為依類象形的“文”和形聲相益的“字”，花了畢生的精力，寫作了《說文解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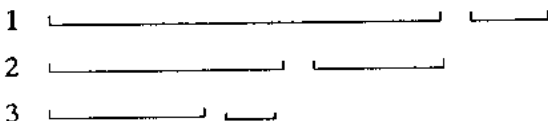
二 《說文》的歷史地位

1. 理論的貢獻

《說文序》是漢字學的綱領。它系統地闡明了漢字的產生、發展、功用、結構方面的問題。漢字的產生跟一切文字的產生一樣，是社會交際的需要。八卦雖是法定的圖象，但不能記錄紛繁的事物；結繩雖能留下記憶的綫索，但絕不能適應“庶業其（極）繁，飾偽萌生”（見《說文序》）的社會發展的需要；只有能够互相區別紋理的漢字，才能察“萬品”，治“百官”。漢字不論是體式還是內部結構，都在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許慎辛辣地批駁和嘲笑了漢字凝固不變的觀點。《序》就是一部東漢以前的漢字發展史。除體式發展之外，《序》還論及漢字內部結構的發展。“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許慎認為，文是源，字是流。漢字是沿着簡單到複雜、文到字的孳乳浸多的方向發展的。《序》對文字的功用的論述是明確的。“著于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將文字連貫起來寫明在竹帛上叫作書，書就是如描寫對象之情狀。聯系到《說文》正文的大量引用書證，讓詞進入語句中確定意義，就知道許慎是把文看作記錄語言的符號的。“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以上均見《說文序》）說明文字是超時空的、超階級的工具，是人類文明的載體。文字雖然沒有階級性，但在有階級的社會裏，文字却是統治者維護統治的最重要工具之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見《說文序》）就說得再明白不過了。

“六書”說本來是戰國末年以來流行的文字學理論，見于《周禮·地官·保氏》。直到西漢末年才有六書細目的記載，見于劉歆的《七略》，班固曾轉引在《漢書·藝文志》裏。後來，鄭衆給《周禮》“六書”也作了一個注。班、鄭各有名稱和次第，但沒有闡明六書的內容，更沒有具體分析繁多的漢字。許慎第一次對六書作了界說，並且在逐字的說解中，將六書原則貫徹始終。許慎牢固地建立了漢字結構理論體系。先看看六書分類的標準：在《說文序》中，他指出“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這是從認字識字的過程說的。“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這是從畫物顯象的角度說的。“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這是從組合部件匯合意義的角度說的。“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這是從字符與字的關係，即形符、聲符與形聲字的關係的角度說的。“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這是一類特殊的形聲字。“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這是從把意義寄託在音同或音近字的角度說的。但就不增加新的形體來說，它是一種用字的方法；就表達與本義毫不相關的意義、傳遞新的信息來說，未嘗不可以說是造字的方法。整體說來，作為造字的方法，六書的基本層次是清楚的。

指事 象形 會意 形聲 轉注 假借



第一個層次是用是否借同音字表義為標準，第二個層次是以有沒有表音成分為標準，第三個層次是以獨體顯象還是合體會意為標準。真正有些模糊的，就是部分指事字和象形字的界

限。這是由于它們沒有一個統一的邏輯分類標準。

自許慎以後，近兩千年來，不斷有人對“六書”理論提出批評、修正、補充。就以今人來說，唐蘭在《古文字學導論》、《中國文字學》裏提出了“象形”、“象意”、“形聲”三書說，陳夢家在《殷虛卜辭綜述》裏提出“象形”、“形聲”、“假借”三書說，裘錫圭在《文字學概要》裏提出了“表意”、“形聲”、“假借”三書說，他們在各自的研究中有所發明，有所創造，不同程度地豐富了漢字的構形理論。但是許氏“六書”說，作為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來說，上述諸說誰也沒有從整體上改變它。于省吾通過甲文研究，發現了部分表音的獨體象形字和附劃因聲指事字。（部分表音的獨體象形字：見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釋具有部分表音的獨體象形字》。附劃因聲指事字：見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附錄：釋古文字中附劃因聲指事字的一例》）照于氏的說法，前者補充了象形字向形聲字發展的一個過渡環節。其實就于氏的八個例證看來，所謂表音的部分，全是誇大了的被記錄事物的特徵部分。人們依然可以把它看成一般的象形字。後者不過是在義異、形同、音近字上加了一個區別的記號，也依然可看作是一般的指事字。科學的進步離不開愈來愈精細的分析，于先生上述兩類字的發現是極精極細的分析的結果，如果地下發掘的文物上的例證愈來愈多，也許會愈來愈顯示其論證的光輝。但即令是到了那個時候，于先生還是沒有脫離許氏六書說的理論系統。可見許氏六書說的偉大。

2. 編排的獨創

《說文解字序》說：“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也。”部，就是部首，是字形結構部類之首。按照六書的原則，分析字形結構，把

在結構上具有相同部分的字排列在同一部類，用這相同部分作為統率這一部類所有字的標目，這個標目就叫部首。《說文》中常有“凡某之屬皆从某”的述語，它的意思是，大凡某的部屬都隨從某聚集在一塊。這個某，就是部首。將一萬多看來毫無頭緒的漢字，以形為標準，分為五百四十部，這是許慎的獨創。

周代的字書，漢代還保存着的是太史籀寫的十五篇，它的體例大約與秦代合編的《倉頡篇》相同。秦代由《倉頡》、《爰歷》、《博學》合編的《倉頡篇》，每章十五句，每句四個字。《訓纂》、《滂熹》與《倉頡篇》相同。《凡將篇》每句七個字，《急就篇》與它相同。這些字書的體例都是雜亂地採取需要的實用的字，按照文理編成有韻的句子，與後代的千字文一類的捷徑雜字沒有什麼不同。史游的《急就篇》也自稱“分別部居”，它的分別是：姓名是一部，衣服是一部，飲食是一部，器用是一部。自然比不上《說文》根據形體分門別類加以集中的辦法。

段玉裁評價許慎的部首制說：“凡字必有所屬之首，五百四十字可以統攝天下古今之字，此前古未有之書，許君之所獨創。若網在綱，如裘挈領，討原以納流，執要以說詳，與《史籀篇》、《倉頡篇》、《凡將篇》雜亂無章之體例不可以道里計。”（見《說文解字注》）

部首制既屬許氏的獨創，當然難免有不完善不精當的地方，比如：無“群”部首，疊文會意字部首，聲旁部首，異體字部首，古今字部首，等等。另外，許氏以小篆為解說的對象；“就形以說音義”，實際上是據義歸部，是造字法部首。與後來以楷書為對象，據形歸部的檢字法部首的要求相距較遠。所以歷代文字學家對許氏部首有或多或少的改供。南朝顧野王《玉篇》定為 542 部，

遼代行均《龍龕手鏡》定為 242 部，明梅膺祚《字匯》定為 214 部，《新華字典》1966 年版定為 189 部，《辭海》1979 年版定為 250 部，《漢語大字典》和《漢語大詞典》訂為 200 部。但是不管人們怎麼改併，不管有多大進展，在漫長的一千九百年間，許氏的部首制，作為一種檢字的系統，誰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它。而且可以斷言，它將與漢字同在。

關於部次，許慎的原則大體是：“始一終亥”，“據形系聯”。所謂“始一終亥”，就是根據漢陰陽五行家“萬物生於一，畢終於亥”的說法，以“一”部開始，以“亥”部結束來排列部首。所謂“據形系聯”，就是把形體相近的部首排列在一起。試以《說文》第八篇前六部（本書卷十五）排列為例（括號內的字是段玉裁的說明）：

 (不蒙上)
 (倒  而次之)
 (反  而次之)
 (并  而次之)
 (反  而次之)
 (二  相背而次之)

“不蒙上”，就是不承繼上面的形體，由“人”部單立“戶頭”。把“人”形倒過來，就是“變化”的“匕”。把人形反過來，成了“匕匙”的“匕”。兩人相隨，成了“聽從”的“从”。把“从”字反過來，成了“排比”的“比”。兩個人字背靠背，成了乖背的“北”。這些部首次第的排列，全都根據“人”形的變化連類而及。這就是“據形系聯”。《說文》第八篇共 36 部，大都如此。只有“衣”、“裘”、“毛”、“毳”等部，與“人”形無直接關係。《說文》部首也有以意義